



福柯思想辞典

DICTIONNAIRE FOUCAULT

朱迪特·勒薇尔 (Judith Revel) 著

潘培庆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福柯思想辞典

DICTIONNAIRE FOUCAULT

朱迪特·勒薇尔 (Judith Revel) 著
潘培庆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柯思想辞典/(法)勒薇尔(Revel, J.)著;潘培庆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6

(思想家和思想导读丛书)

书名原文:Dictionnaire Foucault

ISBN 978-7-5624-9096-8

I .①福… II .①勒…②潘… III .①福柯, M.

(1926~1984)—哲学思想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0269 号



福柯思想辞典

米歇尔·勒薇尔 著

潘培庆 译

责任编辑:邹 荣 林佳木 雷少波

封面设计:邹 荣 版式设计:邹 荣

责任校对:秦巴达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90×1168 1/32 印张:7.125 字数:165 千 插页:32 开 1 页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24-9096-8 定价:42.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译者序

福柯的思想和启示

法国在 20 世纪向全人类贡献了两位世界级哲人，一位是萨特，另一位就是福柯。福柯的很多著作自 1980 年代就不断有中译本问世，但福柯的思想却深奥难懂，这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他的涉猎面极其广泛，其学问贯通古今，还跨越了现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20 世纪恐怕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涉足如此众多的领域。跨学科研究本身并不可怕，但如果完全打破学科界限，读者就容易被搞得晕头转向。其次，福柯的研究领域非常古怪，什么疯癫啊，监狱啊，性状态啊，这些东西能进入哲学殿堂吗？自古以来，哲学家们都热衷于探讨宇宙、世界或者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其本质属性，热衷于研究人和世界的关系，人的认识来源等。但在福柯这里，疯子在古典时代被关押，各种不同性质的犯人在 18 世纪都被投入监狱，人的所谓性状态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这些内容居然都成为福柯的研究主题。由于大多数读者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题材，缺乏相关知识方面的准备，难免会不知所措。还有，福柯做学问的方法也非常独特，他研究哲学、历史都不按通常规则，而是自搞一套，而他这一套可用不入类来概括。不入类，仅仅这三个字大概就可以难倒大部分读者，因为凡是接受过一般教育的人，都习惯于现代科学的分类，都习惯于各学科的基本概念、所使用的方法、结论，等等。当我们用这些老套子，或者福柯所谓话语的秩序，以此来阅读

福柯，那就难免不知所云。就好像每个井底之蛙都自以为自己的天地最大，自认为发明了一整套话语逻辑，由此来解释自己的天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但如果有一天，来了一个外乡人，告诉每一个井底之蛙，说它们各自的话语实际上都遵行着某种共同的规则，井底之蛙难免要愤怒，好像侵犯了它们的知识产权，否定了它们的创造发明。福柯就是这样一位外乡人。要理解这样的外乡人，那就不能袭用每个井底之蛙的那一套话语，而要另辟蹊径。

福柯的思想难解，并且多变。譬如他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这样谈论他的写作自由：“写作是为了不再有一张面孔，像我这样的人当然不止我一个。请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要求我始终如一：这是关系到身份时才用得着的道德，此道德管理着我们的证件。但愿它能够在我们写作的时候让我们自由。”没有一张固定面孔，没有一个固定身份，这至少在户籍和身份管理方面无法确证一个人。实际上，福柯的话只是表明他在写作时，在自我创造时所享有的自由，即他的思想在不断变化，不能要求他始终如一，如同保持一个人的身份（性别、年龄等）那样。福柯被归入所谓解构主义学派，如他解构主体，解构现代社会，解构现代人，解构现代社会科学，等等。那么，福柯本人的思想是否也可以被解构？按福柯的思想，任何话语、任何实践、任何人都不能脱离历史，它们都是特定社会和时代的产物，那么福柯本人的思想也离不开其历史限定性。再按福柯的话语理论：谁说话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话人要遵守说话的规矩；这就是说，不是说话人创造了他的话语，而是话语规则制造了说话人及其话语。一个没有固定身份和面孔的福柯是难以把握的，但用福柯自己的话语理论来分析他本人的话语，那么他本人的话语就绝对不是天上的云彩，飘忽不定，相反它们同样遵循着某种规则。总之，福柯本人的思想也是可以被解构的。

如何理解福柯这位解构大师本人的思想？这本《福柯思想辞典》就提供了不少线索。譬如可以从福柯的“破”和“立”来入手。

关于主体。人类的社会发展史，思想发展史，大都以人为中心。即使在中世纪神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表面上是神解释一切，实际上站在神背后操纵的还是人，人的意志、人的愿望。用福柯的话来说，这个人就是主体。福柯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就是反对这样的主体，用这本辞典作者的话来说，也就是反对“唯我论的、非历史的、自我构成的、绝对自由的意识”。这样的主体唯我独尊，以他自己为世界的中心，他无疑是超越历史的，是绝对自由的。福柯开始学习哲学的时候，正是“二战”之后，当时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尤其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盛行一时。而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主体即是世界意义的创造者。萨特有一句名言，叫做“存在先于本质”，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人的所谓本质实际上是人自由选择的。然而按福柯的研究，这样的自由主体人根本就不存在，人永远处于权力/知识的配置之中，或者说，人在根本上就是由具体时代的话语秩序和权力配置所制造的。福柯在破除了唯我论的自由主体之后，建立了一个处于特定时代的权力/知识配置重压之下顽强抵抗的主体。

关于对象。一方面有主体人，另一方面有对象；人研究对象，思考对象，由此开始了人的认识过程；随着认识不断深入，对象的秘密不断被解破，人的知识也不断积累。这是一般人的看法。但在福柯这里，非但人并非一开始就存在，对象也同样不是一开始就存在。譬如福柯研究现代人的性：一开始并没有一个原始的性，一个包含人的所有秘密和真相的性，福柯的出发点是各种异质的东西，如政治的考量，经济的要求，道德问题；涉及性状态的则有：婚姻问题，手淫提出的严重社

会问题(尤其是青少年的手淫,如何防止手淫的各种措施,医学界、学校、家庭如何被动员起来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反手淫运动,因为手淫关系到后代的身心健康),同性恋提出的严重社会问题(这不仅违反道德,而且在根本上违反自然安排),神经质女人提出的社会问题(由于妇女担负着子女的教育,神经质女人和歇斯底里的女人显然无法担此重任),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性行为。人的性状态就好像是一块磁铁,一系列话语和实践都围绕此展开。于是就必须对各种性状态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划分出符合自然本性的规范性状态和违反自然本性的反常性状态。性状态成为揭示人的庐山真面目的关键,可它却十分脆弱,稍有不慎就会出偏差,所以儿童、青少年、成年人、老人、男人、女人,每个人的性状态都可能出现问题。鉴于有这么多问题亟待解决,于是国家权力会同医学界、教育界、教会合力攻关,这就给国家政治提供了干预个人最隐秘私生活的合理契机,使国家政治得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夫妇的睡房,进入青少年的卧室。这么多的性状态问题同时也成为科学话语的研究对象,于是专家学者们要进行调查,并号召人们解放思想,都来谈自己的性状态,学校也开始了性教育,丰富多彩的谈性活动就这样广泛、持久、深入地开展起来。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性这个对象的诞生。人们一般总认为先有性,然后才有关于性的话语,福柯则认为这个过程正好相反。这里可以注意到福柯的一个方法论,也就是他的解构方法:每当涉及某个对象,对象不是上升为中心,而是退居后台,接二连三登场的却是那些表面看来和对象并无直接关系的各种因素,如战略、技术、人员、机构……正是这些因素制造了对象。如果由此来研究现代人,那么现代人立刻退居后台,那些制造现代人的各种因素则会纷纷登场,占据舞台中心。福柯在此打破了对象所占据的中心位置,确立了制造对象诸因素的首要地位。

关于历史的连续性。历史从古到今是连续的，今天是从昨天来的，昨天是从前天来的。谁在时间中连续？当然是某个对象，所以连续性的概念实际上是和对象的起源和发展相联系的。就像上帝造天地、造人，这样天地万物就诞生了，然后一直延续下来。这样的对象起源观和历史连续性可能使人感到安心，但这样的对象历史却没有革命性的中断。福柯在此引进了中断概念。没有什么绝对的起源，任何事物、任何对象，从来就处在其关系网之中。历史也不是呈线性发展的，历史是一段一段的。譬如福柯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认识体系：在文艺复兴时期，“相似性”成为构成话语的规则，在17世纪的古典时代，“表象”成为构成话语的规则，现代的认识体系则以“人”为中心。既然此“人”由现代一系列可能性条件制造，那么一旦新的可能性条件出现，“人”就会像沙滩上的脸孔一样消失，这就是所谓“人之死”。这些相继出现的认识体系，它们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所以福柯用中断把它们隔开。每个认识体系都产生了相应的话语及实践。这里，福柯打破了历史的连续性，确立了中断的地位。既然历史不再是连续的，那么历史也就没有什么固有的目的。

关于权力。福柯的权力分析非常有名。按照近现代的政治学，人们通常把权力局限于国家主权、君权，还有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这样的国家主权位于社会的金字塔顶端，它向全社会发号施令，它的化身或者是皇帝、国王，或者是代表国家的某一团体。福柯完全颠倒了这样的权力观，他所谓的权力绝对没有一个中心位置，其功能绝对不能归结为政治上的统治，它也不属于任何人。福柯通过对现代社会的研究，发现在现代社会运行的主要权力并非国家主权，而是弥漫于全社会的各种毛细管权力。譬如由边沁发明的敝视监狱，由此监狱模式而发展起来的监视模式被广泛地运用于全社会：在监狱被用于

监视犯人的一举一动；在工厂车间被用于监视工人，防止怠工和偷窃；在学校被用于监视学生，防止违规行为；在医院被用于监视病人，如此等等。现代社会的秩序主要不是由国王或国家权力维持的，而是由遍布社会的毛细管权力维持的。由此来看，政治的起点并非国家主权，而是社会基层人际关系中的各种微观权力，如夫妇，男人和女人，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权力关系；扩大到社会上，则有老师和学生，医生和病人，政府工作人员和公民之间的权力关系。如果大海是由江河最后汇集而成的，那么国家、阶级都是大海，并由此形成宏观权力观；现在福柯研究了遍布社会的涓涓细流，这就是遍布社会的各种微观权力关系，他由此提出了微观权力观。法国大革命早已砍去法国国王的头颅，但那么长时间过去了，现在当很多人在思考权力的时候，他们依然在按照君权模式思考权力，而福柯提出微观权力观，就是要在人们头脑中再次砍下君主的脑袋。这是一次福柯式的革命。

关于界限。按福柯的解释，所谓界限就是一种文化中暧昧的、难以表述的、不可言说的东西。界限并非无关紧要，它的作用十分重大，只是一般人忽视了它的价值。一般人只注意到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的所思所说。一个只认识本村的人，本村以外的县城、省城都是他的界限；反过来可以说，他对本村的认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了县城这一界限。任何文化都是有界限的。在福柯的《词与物》一书中，有一段博尔赫斯(Borges)引用中国百科书籍中关于动物的文字，一大堆完全不相干的概念被罗列在一起，这对西方人就是界限，因为这种排列和分类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理解力。实际上，正是界限构成了我们所思所说的条件。若没有界限，我们的思想和话语就会陷入云山雾海，或者如中国古代哲学所谓阴阳未分的混沌状态。现代理性是如何可能的？因为有了疯癫这个界限。由此可以看到福柯思想的一个方法：通过界

限来探讨对象。要了解一个社会，主要不是看它产生了什么话语，有些什么实践，而是看它排斥什么。因此，人类的话语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话语的界限。福柯所谓认识体系，就是特定时代生产相应话语的规则，它就是界限，超过此界限的就无法言说。现代理性人如何可能？因为理性人在疯子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界限，由此看到了自己的所谓本质，以及自己和疯子的根本区别。要了解现代理性人是怎么回事，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无须进行什么哲学思辨，只要去看看那些被作为反常者而被关押的对象就一目了然了。从最初被关押的疯子，到后来又陆续加入了各种各样不合社会规范的人群，妨碍现代资本主义新秩序的人群，他们都是被排斥的对象，而福柯正是通过他们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可能性条件。研究疯癫、监狱、性状态等，这些都是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东西，福柯却在其中看到了被社会排斥的对象，并通过它们看到各种新人物、新机构、新知识、新技术、新战略粉墨登场，看到了各种生物权力的诞生，看到生物政治登上历史舞台。最后结果是整个社会的转型，生物权力居然悄悄地取代了封建君权。当然，福柯最初研究疯癫，如关押疯子事件，他未必能认识到其中的现代化管理和控制意义。他继而又研究监狱，后来又研究性状态；他最后把这一切综合起来，竟然汇成了浩浩荡荡的现代化潮流。总之，从界限来研究人，研究社会，实际上就是通过制造人的种种因素及其关系来说明人，说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是他的界限，他能够认识什么，能够做什么。我们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知道，现代资本主义是通过殖民掠夺、殖民战争、贩卖黑奴等暴行发展起来的，在福柯这里，我们至少还听到了西方社会内部疯子们的痛苦喊叫。

关于关系。福柯研究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他的一个主要方法就是通过关系，即通过构成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一系列相关因素及其关

系,而不是通过社会的本质,人的意志、意识及其心理结构等。所谓关系,就是距离、间隔、差异。鉴于差异在福柯构建其思想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那就不妨从差异来理解福柯的思想。从本辞典中可以看到,福柯的差异思想受到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通常,人们注重实体及其本质属性,至于实体之间的关系则是次要的;先有实体,然后才有实体间的关系。索绪尔则相反,他认为实体之间的关系是建设性的,实体并不先于关系而存在,实体反而是实体间关系的产物: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差异构成了符号,符号间的差异则创造了意义链。福柯借鉴了这一差异思想,用此思想来开展他的研究。譬如他用此思想来研究主体,主体马上就丧失了其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构成此主体的各种可能性条件。由此来看,福柯的思想可以说主要就是一种涉及关系的思想:认识体系就是探讨话语之间的关系,权力关系则是一种角力关系。不妨以现代个人为例来说明。按照近现代传统政治理论,先有个体或者个人,然后个人根据其需要,或者是为了和平,或者是为了避免战争,或者是为了实现公正等,由个人之间制定契约,达成协定,每个人都放弃自己的部分自然权利,由此组成国家。在此意义上,个人就是现代社会和国家的基础。但在福柯的研究中,读者看不到这样一个原始的个人,或者所谓自然状态中的个人。人们看到了理性和疯癫的大划分,于是疯子被关押起来了。当理性成为人的本质属性,成为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源泉,疯子却被视为异类,甚至沦为动物。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新兴资产阶级要按照其意愿来建立新的秩序,社会上当然会有一批敌对者、破坏者,还有一大批不适应新秩序的人群,新兴国家开始把所有这些人都关押起来,不让他们扰乱新秩序。如亵渎神灵者和不信教者会扰乱人心;荒淫的放荡分子、同性恋者、手淫者,他们则会败坏社会风气,也会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流浪汉、乞讨

者，他们成群结队，到处流窜，他们会严重干扰居民的正常生活。这些人都被分门别类，被贴上标签，而此标签也就成为他们各自的身份。另外，国家要发展，要强大，就必须建立强大的军队，现代化军队建设开始了：每个士兵都要从最基本的动作开始训练，必须熟悉队列操练，掌握武器的使用方法，知道自己在打仗时承担什么任务，位子在什么地方等。现代士兵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现代大工业生产需要集中大量工人，但又不能让他们聚众闹事，不能让他们怠工，同时又要求他们掌握生产技能，提高生产效率，这就必须使用一整套分割技术或个体化技术，让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和生产指标。一方面要制造工人的独特性，但同时还要制造其中立性，这样才可以让工人们能够轮班工作，可以相互替代。现代工人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至于现代教育，则根据学生的年龄、知识水平和技能掌握程度来划分年级，每个人的学习情况则按照教学要求来打分，于是每个人都被贴上某种标签，如优秀、中等、不及格，现代学生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实际上，在整个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身份，也知道自己在好、中、差等级序列中的位子，以及自己的努力目标等。由此来看，近现代传统政治理论所设想的作为社会和国家基础的个人也许根本就是一个神话故事，现代个人主要是由一系列外在于个人的规训技术和实践造就的。

以上几个方面或许能够大致勾画福柯的思想轮廓，我下面想谈一谈福柯思想对后人的启示。福柯对近现代西方的现代化过程进行了独特的研究，他的思想当然不可能都正确，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毕竟提出了一家之言，而且有相当的事实根据。福柯的研究虽然立足于西方文化，但他的思想对非西方文化也有启示作用。依我看，以后恐怕会有一门福柯学，不仅研究福柯的思想，尤其是运用福柯的某个

概念、某个想法、某个方法来研究现实的问题，解释现实中的现象。而这恰恰也是福柯本人的愿望，即给人提供一个“工具箱”，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从中选择符合自己意愿的工具，去进行自己的探索。福柯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不管是考古研究或谱系调查，根本问题都在于了解我们自己的由来，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如何在特定历史中构成的，这样才有可能进行新的自我创造。由于全球化进程，人类社会的一体化速度正在加快，西方国家的问题和非西方国家的问题，它们之间的距离正在缩小。在此意义上，福柯的思想不仅属于西方，也属于全人类。

关于排斥。按照福柯的看法，现代理性是一种包含性排斥。古代西方的流放就是一种排斥：把犯人或者异见人士送到边远的小岛上，或者某个遥远的荒蛮之地，犯人根本没有返回的可能；让他们在流放地自生自灭，他们不再属于原来的人类社会，就像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这就好比人身上长了一个肿瘤，通过手术把它切除，这个被切除的肿瘤不再是患者的一部分，它被扔进垃圾桶，最后作为垃圾被填埋。但现代理性却不是这样：它一方面按照某种标准指定了排斥对象，同时却又让排斥对象继续生活在理性人的社会中，于是就有了古典时代的大关押。关押对象呢？首先是理性的排斥对象——疯子；后来，关押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于是同性恋者、亵渎神灵者、不信教者、败家子、流浪汉、叫花子等人也纷纷被投入关押大军。由于把疯子和其他人关押在一起，疯子便沦为其他人的出气筒，被捉弄，遭殴打，甚至被乱棍打死。在德国一些疯人院，疯子甚至成为参观对象：窗户上装着栅栏，以便让参观者从外面安全地观看被捆绑的疯子。在有些地方，理性人甚至把这种参观活动变成了旅游观光活动：观光者必须付一个铜板才能观看那些行为暴烈的疯子，而此类活动竟然每年吸引了

大批参观者。至于疯人院的看守人，他们也练就了一套功夫，他们居然能够让疯子进行表演，手段是挥舞手中的鞭子。到这里参观，这意味着什么？参观者是理性人，是符合规范的正常人，而疯子则是反常者，已沦为动物。通过参观，理性人的尊严再次获得肯定，理性人的价值也获得充分实现，这使理性人趾高气扬，感到自己的高等、高贵，使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蔑视疯子。既然疯子被视为动物，而据说动物能够忍受炎热、寒冷、疼痛等，所以根本不用给疯子穿衣服，取暖。由此来看，理性主义一方面制造了一个有着无上尊严的理性人，同时也制造了被歧视、受嘲弄、被迫害的疯子。如果到处滥用这种理性的划分，譬如将此划分用于研究人种，那么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各种族之间立刻就有高等和低下之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种族主义、种族隔离、种族灭绝。为了扩大优等民族的生存空间，就必须挤压，甚至消灭劣等民族。希特勒要消灭犹太人的计划就是这种划分逻辑的一种后果。问题是如果这种划分毫无限制，就必然会走火入魔：就算雅利安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任何其他民族都必须让位，但雅利安民族中难道就没有傻瓜、精神病人、老年痴呆患者、残疾人？当然有，那么也必须除去；以此类推的结果就是雅利安族最优秀的精英中也必然会有堕落腐败分子、患有身心疾病的人士等，那也必须淘汰，这样就会永无宁日。“二战”后，很多西方知识分子都谴责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非理性主义，实际上根本问题并不在于非理性主义，而在于自古典主义时代关押疯子数百年以来的理性划分逻辑。20世纪提供了太多的歧视、排斥、迫害的例子，是否现代理性本身就包含了某种非理性的病毒？福柯对疯癫的研究很值得后人深思。

科学概念和科学知识一向被认为是客观的、中立的，超然于人间的是非。但福柯通过对话语的分析，发现话语、概念、科学知识可能包

含排斥,而一旦这些概念和政治实践相结合,就会导致严重的暴力。西方社会参观疯子的例子使我想起自己在童年时代遇到的一个相似例子:听说我家附近有一个疯子,举止狂暴,而且吃生肉,其家人不知为什么没有把他送入精神病院,而把他关在家里,但为了防止他的狂暴举动,只好用绳索把他捆绑起来。就这样一件事,周围的人,甚至住得很远的人都知道,每天有很多人前来观看。这种好奇心应该说是完全没有恶意的,或者在科学上也应该是中性的。但如果从福柯的分析来看,这种貌似无辜的好奇心、猎奇心实际上也包含着歧视和排斥。这又使我想到社会和排斥的问题。在当今国际贸易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叫做“双赢”,即贸易的双方都是赢家,没有输家。对一个社会来说,也能做到没有输家吗?一个社会能够做到不歧视任何人,不排斥任何人,不打压任何人吗?恐怕很难设想会有这样的社会。今天的人道主义者应该考虑的恐怕还是一个没有排斥和迫害的理想社会,而是如何不断改良社会制度,把歧视和排斥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同时尽可能善待被排斥者,因为毕竟是同类。依我看,今天的理想社会应该是一个能够不断发展,同时又能够把社会代价和自然环境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社会。

关于里维埃的凶杀案。福柯对所谓“卑贱者的生命”深感兴趣,并把他们默默无闻的片段人生视为新型权力控制普通生命的遗迹。这种兴趣让福柯挖出了发生在 19 世纪的一桩凶杀案。1835 年 6 月 3 日,法国诺尔曼地区的一位年轻农民,他叫皮埃尔·里维埃,他用砍刀残杀了他的怀有身孕的母亲,还杀害了他的妹妹和弟弟。罪犯被判处死刑,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他于 1840 年 10 月 20 日在牢房里上吊自尽。据他在狱中写的回忆,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他的父亲,他认为母亲虐待父亲,而妹妹则站在母亲一边;至于他还杀死了父亲喜爱的

弟弟,则是为了让父亲活得更幸福,不必为罪犯儿子感到惋惜。如果按照传统的王权司法,这样的弑母凶犯肯定会被判处极刑,并立即执行。但罪犯最后被判无期徒刑。为何有此最终判决?这不能从司法体系方面寻找原因,而要从当时登场的各种新兴力量来解释,如精神病医生、犯罪学知识等。改判无期徒刑,是因为当时的专家学者们经过医学检查,确认罪犯不是普通刑事犯,而是精神病患者。而广泛的社会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村民们就揭发:罪犯从小就表现异常,还残酷地虐待小动物。但当时的专家学者们还是有些尴尬,那就是罪犯自己写的回忆录。能写出如此回忆录的人还会是疯子吗?不错,人的精神也像人的身体器官一样会出问题,但罪犯的回忆录却清楚明白,他根本不像一个精神病患者,所以他的回忆录很难被纳入精神病话语体系。罪犯最后还是被当作精神病患者处理了。福柯认为此回忆录就是罪犯对当时的生物权力话语体系的反抗,也就是说,罪犯通过回忆录重新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体,他完全不管当时那套新兴的科学话语秩序,直接说出他自己要说的话。由此案例可以使人想到人类社会的司法体系存在着两个普遍现象。首先,罪与非罪,定罪的标准,罪行的认定和定性,以及最后的判决,并无绝对的标准,而主要取决于特定社会和时代的权力/知识配置。如果从本质论出发,很容易把某种行为和犯罪的本质联系起来。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福柯的反本质论,或者反本性论倾向:疯癫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犯罪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人也同样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其次,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每当一种学说、一种技术、一种战略、一种潮流占据上风,它们总是趋于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把手伸向尽可能多的领域,即使遇到难以解释的事件和人物,不知强以为知,于是就会发生强行入类的现象,扩大化现象就这样发生了。当一种社会潮流汹涌而来,不幸沦为被排斥的

人士，尽管他们的问题千差万别，但他们最后往往都被“一刀切”了。按福柯之见，即使时至 20 世纪 70 年代，面对里维埃的回忆录，今日的精神病学家和犯罪学家们恐怕还是和当年的专家学者们同样尴尬。在此意义上，里维埃也许是现代史上第一个“被精神病”的罪犯。

关于福柯的反人道主义倾向。现代人道主义是文艺复兴后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思潮，倡导人的价值和尊严，这种人道主义的一大支撑就是人的理性。福柯质疑由此理性主义而来的若干话语和实践，如把疯癫视为理性的对立面，并关押疯癫者，对他们的治疗不过是道德训诫加警察式的暴力；建立所谓规范话语，由此排斥、迫害反常者，如手淫者、同性恋者等；建立规训话语，广泛复制类似敝视监狱模式的建筑，监视并操控个体的行为……。由此福柯怀疑所谓的历史进步，这里确有某种反人道主义的倾向。但这个“反”字值得仔细考虑。实际上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反，不同层次的反，不同角度的反，不同立场的反。就以中国古代道家而言，它就有一种明显的反智主义。但无论道家如何反智，不能否认道家本身就是人类智慧的一种表现。如果由此来看，福柯恐怕只是反对某些人道主义，某些理性主义的话语和实践。但他关怀社会上遭歧视、被排斥、被视为异类的底层人群，关注他们的不幸遭遇，这在根本上是否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表现？恐怕可以从这里看到福柯思想的价值，即当现代理性人讴歌人的伟大、人的尊严，福柯至少指出了这样一个大写的人，也就是理性人占绝对统治地位背后的另外一面，一个不为人知的一面，或者说福柯指出了哪些人为这种理性统治付出了代价，直至生命的代价。就像现代大工业生产，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类生产力较之于古代不知提高了多少倍，人类生活水平也相应提高，但这里同样也有一个代价问题：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疯狂开采（能叫做理性的开采吗？），导致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日益恶